

主编：叶澜 全球化、信息化与学校变革丛书

全球化进程中的 学校变革 杨小微 著

——一种方法论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叶澜 全球化、信息化与学校变革丛书

全球化进程中的 学校变革

——一种方法论视角

杨小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一种方法论视角/杨小微
著.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ISBN 7-5617-3661-4

I.全... II.杨... III.学校教育-教育改革-研究 IV.G5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319 号

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 ——一种方法论视角

主 编 叶 澜
著 者 杨小微
责任编辑 徐振明 金 勇
责任校对 李雯燕
封面设计 高 山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 //www. ecnupress. com. 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5100
书 号 ISBN 7-5617-3661-4/G·1977
定 价 23.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全球化、信息化与学校变革丛书

主编 叶 澜

编委 叶 澜 杨小微 邬志辉 郑金洲
范国睿 唐晓杰 吴遵民

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重点研究项目成果。此项目还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研究基金的支持。

总 序

叶 澜

《全球化、信息化与学校变革》丛书面世了。它是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部分研究人员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重大课题——“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学校改革问题的诊断与对策研究”的研究成果集。丛书主编即是课题负责人，编委会由课题组主要成员组成。该课题自正式立项至丛书出版历时近三年。它是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这一研究群体通力合作、认真探究的产物，是第一项由研究所通过课题招标而获得立项的课题之研究成果，因此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制度改革的产物。

丛书由三本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著作和论文集组成。邬志辉著的《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一书，是他在华东师大担任兼职研究员和进博士后流动站后完成的报告。该书在“全球化”研究渐成热点之时着手撰写，因此，清理“全球化”概念和理论中的各种观点，理出与教育改革的关系并作出评析，是这本著作的基础性部分。作者无论在资料的搜集、梳理和评析上都认真下了功夫，且形成了制度、目标、课程的三维研究框架。作者的另一可贵之处在于以中国的视点与问题为基本立场，展开关于“教育全球化”这个大问题的讨论。他在全球视野和本土立场的统一上作了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全球化的思路。杨小微著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一种方法论视角》一书，则又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提供了认识同一问题的新角度。他把以全球化进展及同时发生在世界上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本土化历程为背

景,聚焦于学校变革所呈现的方法论演变历史和当代的多元状态。作者把学校变革作为一个整体性现象,以社会变革环境中学校与社会的互动为前提,对学校变革进行有机化、历史性的考察,这本身也是一种方法论的选择。其实,任何时期、任何地区的学校变革都有方法论问题,但方法论问题的内在性和非显性,又常常使人们忽视它。这种忽视的后果,常常是使学校变革的意义难以突显、使学校变革的方式方法以及成效不尽如人意,甚至南辕北辙。所以,提出学校变革的方法论问题,并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范例、作出探讨,这种尝试的本身就富有启发性。第三本书是本课题研究的论文和报告集。它主要由三种成分组成。第一是总报告,它建立在各子课题研究的基础上,也阐述了本人作为总报告撰写者的有关这一主题的认识与观点。第二为各子课题的研究报告,分别阐述了中国当代社会有关信息化、学习化、全球化、城市化等一系列“化”中呈现的学校变革的问题与思考。第三是当代中国学校状况的调查报告、个案研究和专题论文等,它们提供了当代中国学校教育变革现状的信息,提出了若干对策性思考与建议。以上三方面的论文或报告,有少部分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发表过,但主要内容都是首次发表。最后书中还将研究过程中搜集到的论文目录作为附录,供对该主题有研究兴趣的同仁查阅。

在本套丛书中,对同一主题提供了多种视角,存在着不同理解。这除了表明全球化、信息化与学校变革的研究还处在初期之外,还企求因差异、不同的提供引出更多的研究和回应。在“全球化”、“信息化”已经喊得震天响的今日,我们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需要深度的冷思考,需要看清别人,更需要研究自己,以及弄明白自己与别人的关系。

我们为此作了努力,并还将继续探求。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对本所该重点研究项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金勇先生为本套丛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2003年9月

导论

全球视野下教育变革的本土化

一、在全球进程中遭遇“本土” 与“全球”关系

无论你愿意与否,发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逆转地出现并将作为一种趋势而不断地诱惑、激励或者困扰着每一个觉醒的国家、民族及个人。全球化不仅是各种实实在在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而且犹如一阵劲风,吹皱一池春水,引发人们不同角度的思考,涌现出形形色色的肯定的否定的或者不置可否的思想、理论观点。在这个各种观点交织和碰撞并使人感到迷茫的思想萌动时期,清理各种新生的概念似乎是首先必要的。

“本土化”这个概念随“全球化”概念的滥觞而凸显,然而人们在使用时往往表达的不是同样的含义。笔者开始注意这个概念是十多年前一位历史学家做的一个关于香港公务员制度“本土化”的报告,回想起来,那是最接近正确的用法,即本来是英国式的西方制度及其相适应的文化在其属地的“地方化”。而今,有些对本土化的用法却似乎是另外一种意思,如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一本书里说道:“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人们担忧的一个特殊缘由

是日益全球化和超越疆界的精英们和其余的越发‘本土化’者之间沟通的不断崩溃”。^① 鲍曼的观点是,(全球化进程中)“这个世界的构筑,并不是一个大家通过市场的整合都得到提高和改善的过程,而是不断地分化成全球性的富人和地区性的穷人”。^② 显然,鲍曼书里的“本土化”,其实是“越来越本土的”或“受困于本土”的意思。如果要在与“全球化”相对应的意义上定义“本土化”,就只能理解为外来制度和文化等的地方化,并且是一个动态发展着的过程,是由外向内的。而与“本土化”相对应的“全球化”则意味着原本是地方性的东西走向外域、变得普遍的过程,是由内向外的。简言之,前者是外来文明或文化的“内化”,后者是自身文明或文化的“外化”。这两“化”不是孤立地或相互脱节(错落)地进行,而是相互交织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一复杂交织的过程,既在形成、丰富和拓展着“全球性”,也在改造、重建或者威胁、破坏着“本土性”。

“本土性”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文明或文化上历史地形成起来的独特性,它既是本身固有的,又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被重新塑形的;“全球性”则是各个不同的“本土”在进行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被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明或文化特性。“本土”是全球性交往的主体,它们相互之间互为“施者”和“受者”,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共在”,构成“全球”。本土之间在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上达成的共识和共同行动,具有“全球”的性质。国内有学者从文明的殊别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意义上指出,一种文明能否被其他文明接受,取决于其内涵的普世价值(如自由、正义、民主、法治等)的多少而不是殊别价值的强弱。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文明”,其实是将其中的普世价值夸大了,并把其中的殊别价值普世化了。^③本土在发生上先于全球,在性质上比全球要“实”、要稳

^① 齐格蒙特·鲍曼著,郭国良、徐建华译:《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第 3—4 页。

^② 丹尼斯·史密斯著:《我们将走向何方》,《读书》2003 年第 1 期。

^③ 参见舒城:《殊别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文明冲突”的另一面》,夏中义主编《人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原载“多维新闻网”)

定、要好把握。只有这样来理解“本土”、“全球”及其相互关系,才不至于把任何一个“本土”当成“全球”。

一些日本学者把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全球化看做是统合进展的同时,反统合、分化、重组的反作用也迅速扩大的复杂变化过程。世界统合的力量越大就越会引起反统合和分化,这样,就有必要弄清楚“接受方”因此而产生的“社会·文化演变现象(或概念)”,并把它放在与全球化同等的位置加以审视。^① 这里说的“社会·文化演变”是一种主动的“变”,这就丰富了本土化的内涵,因为此前人们一般只注意到全球化过程中接受方受外来压力而变化的一面。

由上述可见,全球和本土是同一过程中的一对相互依存的“对待物”、孪生物。全球化和本土化也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尽管全球化看似所向披靡,但是,市场可以统一、生活方式可以趋同,相似的组织和制度可以在不同国度建立起来,却无法真正深入到某一本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去,正是这种内核体现着并生发着本土之间的差异。

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互动,而互动的性质类似“博弈”。根据博弈规律,棋手要与强大对手博弈才能强大自身,因此越是强大的棋手越是需要强大的对手,他不需要对手的恒弱。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一条本土性恒存规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相遇,一般不是简单地融为一体,而是出现至少两种情形:一是趋同,这是共存和交流的基础;二是互相塑造或有意识保留差异,起到平衡作用。例如,二战以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社会重建,虽然在器物 and 制度层面形成了趋同,但实际上又在精神文化层面保留了差异。

强势不会使一切文化都趋同划一,在某种意义上,强势可能比弱势更希望弱势保持自己的独特或本土性。这样看来,本土性既是自有的,又是他者需要的。二战后处于弱势的日本坚持回到集体主义的老路,

^① [日]平野健一郎:《全球化进程中亚太地区的社会·文化演变与区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全球化下的中国与日本——海内外学者的多元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4—35 页。

正是为了保持自我。这个自我,不是不发展的、对他者仅有文物意义的自我,而是发展的、强大的、与他者对等的自我。

本土性的保持和发展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根据对方需要,二是自我选择。

第一种情况即根据对方的需要,也有两种可能,一是错位的,即对方对你本土性的需要是出于猎奇,如外国人普遍喜欢中国武术、美国人喜欢中国的《卧虎藏龙》电影等;而本土方是利用了它者的猎奇心理,把它者的需要变成自己发展的资源,结果是双赢。另一种是不错位或者叫双赢的,如第三世界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良性市场。

另一种情况是自我选择,并非所有的本土性都值得保留,这就必须考虑:保持什么样的本土性才是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实现自我利益?为此已经具备什么条件,还需要什么条件,自己能创造什么条件?

说到选择,这里顺便提一句:也并非是一切全球性都值得吸取或都可以吸取,这同样要从是否符合自身根本利益,是否有条件,要不要创造条件等方面来考虑。

二、本土化过程中的自信与自卑

许多国家在自己的演化史上都经历了外源文化的本土化过程,然而,不同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的基本心态是不同的:有的充满自信,在主动的转型中强大自身;有的表现出顽强,在高压之下仍能坚持自己的本土立场;有的却表现出自卑,恨不得自动放弃发展的自主性和文化的独特性。

1. 美国:“无”中生“有”的本土化奇迹

美国的本土化,建基于人文文化的“无”和自然“文化”(自然地理)的“在”,这种几乎完全的自然状态,造就了“前面就是我的家”的拓荒精

神和“Anything goes”(怎么都行)的行事准则,形成了不得不变动、喜欢变动、总是在变动中发展的文化特征。这一特征使美国的文化充满刺激与活力。

当欧洲列强忙于在全世界靠武力建立帝国的时候,美国人不失时机地发展和壮大了自己,自行建成了大众社会的制度体系,终于在二战结束后,找到了“全球大众社会之霸主”的良好感觉。美国人奥利维尔·如恩斯从美国社会的内在机制出发,寻找这个科研、商业发达的大国崛起的内在动力之源。他的结论是:由企业、政府和大学联手创建的重视实践的科研体系,推动了美国的进步;市场的社会契约使中产阶级得以形成,成为全社会价值追求的理想典范;不同种族的身份认同,丰富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文化,以尊重差异和包容性调解了规范化社会与个性化公民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丰富了民主的内涵。^①一句话,重视个人的整个社会机制,使这个超级大国充满了活力。

美国兴盛的秘诀何在?如恩斯引用别人的评论说:一方面得益于它在科技和工业领域取得的大量原创性成就,另一方面得益于它同步对美国社会进行的谨慎的结构重组。然而我觉得还没有点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本土文化意识的成熟。美国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没有自己的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文化,例如它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均来自欧洲文明,但它原创性地将欧洲文化中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植根于美国这块土壤,结合美国这块土地上的特殊问题,“酿造”出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例如,“美国本土上唯一的哲学运动”,创生了以超越唯理论和经验论、强调关注人类的行为、反对脱离日常行为的“理智主义”,试图使哲学科学化、促进科学与价值协调的实用主义哲学。

2. 日本:外压之下精神文化的坚守

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从近代开始向西方学习的国家,但比起清政

^① [美]奥利维尔·如恩斯著,闫循华等译:《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新华出版社,2002年。

府时期的中国来,它是个聪明得多的“学生”(甲午战争的历史很能说明这一点)。“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各种改革措施,使日本得以“脱亚入欧”,从一个处于亚洲文明边缘的小国,一跃成为对亚洲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侵略大国”。从文化的角度看,西方文明在日本的本土化,不仅仅器物(如科技),也不仅仅制度(如立宪政治),更有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层面的吸收与结合。

二战后美国独揽了日本事务、主导了日本的战后重建,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次特殊相遇,美国试图按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来再造一个“美国中西部”,致使日本的社会生活新框架与美国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美国精神并不能深入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内核(尽管可以带来一些思想观念上的更新),这表现在美国占领结束后,日本政策渐渐偏离了美国式的目标和政策,开始重新确立自己的经济发展重点,他们在选择建立龙头产业的同时,又拒绝接受起初美国人提倡个人主义的做法,重新回到集体主义的老路上。^① 就是美国人自己,也并非真的想把日本再造成一个亚洲的“美国”,为了防止日本将来重走侵略之路,为了给自由民主打下基础,美国人要摧毁日本的“财阀”、摧毁日本的大企业(尽管美国国内极力弘扬大型公司企业)。^②

纵观日本历史,每当社会危机发展到必须改革的关键时刻,日本人总是以吸收来的先进的外来文化为武器进行变革,最终使社会发生质变,从一种旧的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变为新的政治体制和生产方式。如公元645年的“大化改新”是以唐文化为武器推翻氏族奴隶制社会建立早期封建社会,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以西方文化为武器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则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武器,推翻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

① [美]奥利维尔·如恩斯著,闫循华等译:《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70页。

② 同上,第250—251页。

主义的政治体制,举国上下进行经济建设而使日本社会飞速发展。为什么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日本人都能同心协力克服危机?有学者归因于日本历史上形成的“同心一体”的文化深层结构,^①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天皇与臣民的君臣关系以及由这一关系产生的凝聚力,(这一关系后来“与时俱进”地迁移到企业与雇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还有奉公、服从、忠诚、仁义、孝顺、忠君、爱国等等儒家伦理道德深入人心,国家意识高扬和特别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她所著的《菊与刀》一书中,刻画了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及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黷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②事实上,一个积极的本土化过程恰恰是需要既“喜新”又“恋旧”这种性格的,这也许是日本本土文化得以既保持又更新的一个特别的原因。

3. 中国:在与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中渐进的本土化

这里用的“渐进”一词,其实是比较客气的用法,不客气地说就是“缓慢”,从洋务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我们在这80年中已经为“缓慢”付出过许多沉重的代价,然而直到今天,自信的本土化“气质”仍然没有真正形成。“缓慢”具体表现在外来文化输入的由“表”及“里”的过程中。从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睁眼看世界”和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外来文化导致的文化演变的特色就是:器唯求新、道唯求旧,往好里说也只是西方文化在表层(器物层)的本土化。在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期间,甲午惨败使有识之士痛感仅仅学习西方器物技艺是不够的,必须致力于制度的变革,所以有了维新变法的呼号和辛亥革命的尝试,也就是说,这时,本土化进入到制度层面,也涉及到更深的一层,如开始了对国民性的反思和“开民智”的主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广泛开展了改造国民性的讨论,

① 郑彭年著:《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24页。

②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ii,2页。

它所表现出来的强烈反传统精神,显示出对自己民族文化心理的追问和鞭挞,希望把西方近代科学和自由平等、人权等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基本态度、基本方法来改造中国文化,改造中国人,并注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去。显然,目的就是改变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重铸民族新魂。当然,这时有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融会贯通西学的“东方文化”派主张,也有走极端的“全盘西化”主张和回归传统的国粹派主张。^①可以说,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交融中,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开始发生变化。

作为文化传承途径,同时又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教育,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教育学研究上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引进情结”,叶澜教授把“引进情结”称为“从娘胎里带来的记号”。作为教科书的教育学,先是从日本,然后是从美国,建国以后又从苏联引进。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东窗”“西窗”一起开,而对自己的路该怎么走,尽管不停地谈论和寻求,但似乎还看不很清楚。时至今日,我们从一些教育学研究文献中还常能感受到对能否走出“自己的路”缺乏信心。^②“搬运”式地从国外引进、从他学科移植,被动地与别人“接轨”,这实质上是一种本土自卑心理。具体表现在:(1)失去根基,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感到无地自容,把全球化理解为“被别人化”,忽视甚至鄙薄本土性原创;(2)“朝秦暮楚”,什么调子时髦就跟着唱什么调,这是无根浮萍的基本状态;(3)转移依附,从盲目依赖引进、成为外来思想的“殖民地”,转移到简单地借用社会学、文化学的立场,成为其他学科的“实验室”。

4. 在比较中克服自卑、树立自信

与美国相比,我们少了一些开拓与原创,与日本相比,我们又少了

^① 参见安宇著:《冲撞与融合——中国近代文化史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0页。

^② 杨小微:《行走于天地之间——访华东师大叶澜教授》,台湾《教育研究杂志》,2003年第2期。

一点对自身根基的坚守。如何克服自卑、树立自信?笔者以为可以从如下方面考虑:

(1) 找回根基,弘扬原创精神。提倡原创,关键是确立本土的立场。引进情结以“他者”取代“本土”,反映了一种本土的自卑心理。既缺少“创新”,又缺少“原发”,加在一起,就是原创性的缺乏。提倡原创并不拒绝向外来理论和相关学科开放,它强调的是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研究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等,它要求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珍品”。

(2) 以全球为资源,但要求自主选择。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已经将自己置于全球背景之下,尽管目前主要是“参与”经济全球化,但这不可避免地会从文化的表层至深层发生整体上的变化,全球性的科学技术、制度文化、思想观念等丰富的资源均可有选择地用于我们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但关键就在这个“选择”,而且必定是“自主选择”上。日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医学向德国学,理学向法国学,工学向英国学,农学向美国学,政治法律向普鲁士学。一句话,谁优秀向谁学。唯有自主选择才能保证本土文化在不断的变动中“自新”。

(3) 使本土文化价值中“普世”的更“普世”,“殊别”的更“殊别”。前面说到每一种文明中都含有“普世”和“殊别”两种价值成分以及相应的制度,殊别价值有特定的来源,如儒教的来自儒家教化,伊斯兰教的来自《古兰经》,基督教的来自《圣经》,其适用与推广不可能超越所属文明范围的界限,且这些价值之间是平等的,无高下之分。普世价值如人权、自由、平等、正义、宽容及其制度载体如民主、宪政、法治和自由企业制度等等,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了系统化,它们之所以成为普世价值,是因为从大趋势上看正在被各种文明所接受。一种文明的先进程度,不在于是哪一种殊别价值,而在于内含普世价值的多少。我们的本土文化要走向世界,不能简单地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是要提升和扩充其中的普世价值,并将我们文化中的殊别价值置于新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进行检验并加以扬弃和更新。

三、“全球/本土”关系视野下 我国的教育变革

1. 强化教育变革的问题意识

如前所述,树立本土自信要提倡原创精神,而原创的关键首先是有原发性问题。目前人们比较普遍地使用“问题”一词,含义也相当模糊,有时是指某种“麻烦”,有时又是指某种“不正常”,而作为教育研究对象的“问题”,应理解为一个有待澄清的困惑或有待解决的疑难。我们在“全球/本土”关系下考虑我国的教育变革时,首要的任务就是明确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教育变革的主要疑难和困惑是什么。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上几个关乎全局的国家政策和法规的描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①;进入90年代以后,主要问题是“在总体上还比较落后,不能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②;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建立教育新体制的基本框架,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些要求所实际蕴涵的一个基本估计就是:当前我国教育变革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教育观点、制度、内容和方法对社会转型的整体不适应。作为一个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后发国家,又面临着如何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的严峻问题,这两次社会转型都不是自发的而是被“带动”的,换言之,是被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双重转型,既是困惑又是挑战,也是属于本土特有的问题。政府的选择是:顺应国际社会教育革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②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